

古籍保护

专刊



3-6 版

本刊主编：刘晓立
版式统筹：常英

投稿邮箱：liuxiaoli0119@163.com

专题策划

一份年终答卷： 古籍保护人眼中的 2021（一）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新要求，古籍保护工作者继往开来，开启新规划，迈出新脚步，获得新收获。新年伊始，我们邀请高校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等古籍保护领域相关代表，对上一年度亮点成果进行回顾，盘点他们心中的“关键词”；更是对下一年古籍保护事业发展进行分析和规划，透过他们别具个性与共性的观察和思考，一道感受 2022 年的新气息、新风向、新希望。

关键词

古籍传承性保护 数字人文

古籍传承性保护。一年多以来，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师生在原有的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认知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宣传古籍的传承性保护，将古籍保护的视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场所的狭小范围拓展到社会大众的广阔世界。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典籍博览交流专业委员会及典籍文创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为代表，古籍保护的工作重点正逐渐转移至传承性保护，古籍的传承性保护成为古籍保护的学科增长点。

数字人文。2021 年 11 月 16 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

智能开发与利用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2021 年 12 月 22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发起，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召集会议，就教育部修订《博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一事征询专家意见。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古籍保护与数字人文”一级学科，并由文旅部向教育部提出建议。

新成果

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承办的《古籍保护研究》集刊，已与中国知网、维普等数据库网站达成收录合作协议，目前该刊已出版的各辑文章均可在知网上检索并可全文下

载，刊物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不断提高。

在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积极推动下，天津师范大学批准将本校文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含古籍保护学方向）的学制由原来的 2 年延长到 3 年，相应的新的培养方案与课程的更新设计也已完成，这将极大提高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方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古籍保护研究院开设的全校通选课《古籍与古籍保护》在 2021 年第三届《传承的力量》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展示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该课是全国唯一的一门为本科生开设的古籍保护通选课，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新展望

2021 年 9 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二级分支机构“古籍编目专业委员会”成立，挂靠单位为天津师范大学。

古籍编目是古籍保护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工作，是揭示古籍的形式和内容，并使无序的古籍变为有序的过程，更是古籍典藏、阅览、展示、数字化及影印出版等工作的前提条件。成立“古籍编目专业委员会”，将汇集全国古籍编目专家学者的力量，最大程度地发挥专业优势，践行“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助力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彻底开展古籍普查，为全社会了解古籍、认识古籍、更好地利用古籍创造有利条件；



▲姚伯岳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为我国图书馆古籍编目工作持续高质量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助力。

关键词

古籍活化 数字人文
交叉学科 公益行动

古籍活化。2021 年古籍活化取得显著成效，多家主流媒体予以关注，做了大量宣传报道。新华网《地方珍贵古籍保护断档，古籍成“死书”，多种方式活化古籍》、文汇报《流量平台助力古籍活化传承》等报道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央视全力打造的大型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从《尚书》《天工开物》《史记》到《本草纲目》《论语》《孙子兵法》，从《楚辞》《徐霞客游记》《道德经》到《周易》《传习录》，重现中国典籍的辉煌，打通古今，体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果，有利于文化普及和活化利用。

“典籍博物馆”日渐扩大影响，云南省第一家县级典籍博物馆在曲靖市陆良县图书馆建成；各种展览如“册府千华·南雍撷珍——南京大学古籍菁华

展暨中国古代套色版画特展”等古籍活化活动影响巨大。

数字人文。疫情下的数字资源重要性和实用性日益彰显，国家图书馆倡导古籍数字资源网络免费无限制开放，为数字人文注入巨大动力。期待数字人文与元宇宙结盟，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文化自信提供强大支撑。

交叉学科。随着古籍保护多年发展，学科交叉融合日渐成为趋势。将古籍保护列入交叉学科取得业界共识，期待交叉学科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带来新的动力。

公益行动。中国古籍保护事业得到字节跳动等有影响力的公司公益支持，资助《永乐大典》修复和公益宣传片拍摄，给古籍活化增添强大动力。此外，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志愿者行动为古籍保护公益行动带来生气和活力。

新成果

“上海市三年文教行动项目”顺利结项，“文物保护创

新研究院”建设初见成效。

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取得进展，尤其是生物保护实验室建成启用，为古籍保护生物学科学数据采集打下基础。造纸植物科普园种下奉化竹纸主要材料——毛竹；与上海辰山植物园合建专业硕士实践基地，为世界造纸植物科普园作准备。

推进开化纸项目向产业化发展。开化纸造纸植物茼蒿基因培养成果初现，新培育的基因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室外的移栽。

中国索引学会成立数字人文专业委员会，推动中国数字人文联盟发展，筹划古籍索引国家标准研究。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稿抄珍本》（第二辑）编撰完成。

《金光明经》脱酸、纸墨检测、档案编制等系列科学论文在《复旦学报》2021 年第 5 期专题发表，为古籍保护科学数据库建设作准备。

线装家庭家谱制作走进上海外国语大学静安附属小学，

完成毕业班的家谱制作。

新展望

推进古籍 / 文物保护科学实验室建设（写印材料研究）；通过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评审，成为继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天一阁博物院、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中心后新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推动古籍数字人文研究，推进复旦藏古籍善本数字化网络服务工作，完成上海府县旧志索引编制，申报古籍索引国家标准；

筹建古籍 / 纸质文物保护国际联盟，加强纸质文物保护国际合作；

推动国际写印材料合作研究，推进古籍保护瓶颈——材料问题的研究；

加强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推动古籍善本书目修订；希望推动有关部门联合推进古籍保护交叉学科建设，从进一步促进文化自信角度，做好文物保护调查工作；



▲杨光辉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进一步加强国家层面的古籍活化，期待《典籍里的中国》节目扩大关注范围，比如关注《六祖坛经》《闲情偶寄》等典籍，挖掘《六人——泰塔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等档案文献并使其活化。

一份年终答卷： 保护守护好，传承弘扬好，服务利用好

□陈 超 上海图书馆馆长



关键词

守护 传承 弘扬 合作

2021 年 11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古籍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备受关注。国家《“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要统筹推进古籍普查登记、保护修复、数字化建设、整理出版和宣传推广等工作。值此岁末年初，对标党和国家的要求、国内外先进经验，回望 2021，展望 2022，对于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古籍工作记下些许感想与粗浅思考。

与时俱进， 要把古籍保护守护好

对于图书馆而言，古籍保护包括原生性、再生性和传承性等多种保护方式，不仅要依靠“妙手回春”的修复，也离不开“化身千百”的再造，更需要满足长期保存条件的库房建设和科学规范的馆藏管理制度。

上海图书馆拥有一支专业素养极佳的修复团队，2021 年，他们共计修复各类古籍 1504 册 108537 叶（张）。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首次全国性古籍修复技艺竞赛中，出自文献修复部年轻同仁之手的四件作品全部获奖。获奖作品在由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共同举办的“妙手补书可春——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成果展”展出。为提高上海地区古籍修复从业者，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技艺水平，提供交流平台，今年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举办了第五届上海市古籍修复技能竞赛，本市多家古籍保护单位的 9 位青年古籍修复师参加了活动。通过举办竞赛，使各位参与者的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今年，本馆还参与了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建立的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项目，修复团队明年将开展馆藏古籍《瀛寰志略》修复，并形成完整修复档案。

当下，古籍再造不仅要依靠传统的影印出版，更要依靠数字化赋能。我们的古籍数字化保存的基础性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上海图书馆向来重视馆藏文献的整理揭示与开发出版。2021 年由本馆与台湾古籍保护学会合作整理的《青溪旧屋尺牘》《通义堂尺牘》正式出版，是馆藏众多尺牘中文献数量大、涉及人物多、学术含量高、文字辨识难的原件合集之一。近 10 年来，有 30 余位学者参与了释读与审校，高质量地推出了这套重要的文献集成。它的出版将有助于促进清代学术史，特别是扬州学派的研究，也体现了两岸学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不断提升古籍保存保护的科技能力，不断完善提升馆藏管理制度和水平，这是上海图书馆在 2016 年成立独立的典藏部门的初心和初衷之一。近年来，我们持续加强相关实验能力和库房生物防治能力建设，加快推进馆藏清点和盘点工作。2021 年，基于新一代图书馆管理平台云瀚（FOLIO）的馆藏管理系统已经投入使用。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规划调整淮海中路馆舍古籍保存、保护和服务空间，继续提高包括古籍在内的历史文献资源的长期保存能力和服务水平。

雅俗共赏， 要把古籍传承弘扬好

只有面向最广大的公众读者做好古籍的普及性传播和服务，“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才可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传承好弘扬好。

今年，上海图书馆继续联合苏州图书馆，与万代南梦宫公司合作开展“古韵今辉，乐创未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项目”系列公益活动，以“上海工匠”、文献修复部主任张品芳老师为代表的修复专家通过对“古籍修复”和“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两项非遗技艺的知识讲解，带领体验者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非遗技艺的魅力，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该活动已是第二年举办，今年依旧得到媒体广泛报道，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公众推广效果。此项目将在 2022 年继续推进。

此外，我馆还与上海市民政局合作，开展姓氏源流及家规家训的项目。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推出“上海传承家谱家训服务平台”，结合本馆家谱资源，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婚姻家庭文化的主旨精神。市民登录平台，即可获取姓氏对应源流、家规家训、家谱等各类信息，并以纪念卡图片形式呈现，供用户下载留念、分享转发。新人们还可在登记结婚证当日，扫描民政局网点的易拉宝

二维码进入网站获取纪念卡。

去年 8 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推出了以馆所文史专家介绍馆藏特色文献为主要形式的系列科普视频——“观止讲堂”，通过哔哩哔哩这一平台，面向全社会的古籍爱好者播出，首批由古籍专家陈先行与碑帖专家仲威录制的两档节目——“先行说善本”“仲威讲碑帖”一经播出，获得广泛好评。今年又由家谱部主任顾燕、沈从文博士和严洁琼录制了“燕子姐姐说家谱”“沈博士说稿本”和“小严陪您赏年画”，同样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不仅如此，“观止讲堂”同名书籍也将陆续出版。

明年我们要继续探索与社会力量合作，做好馆藏古籍保护成果的推广与弘扬，计划与中央电视台《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合作推出主题展览。今后，本馆将继续推出更多的专家说馆藏方面的视频节目，也将更多地探索与新兴媒体的合作，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汲古慧今， 要把古籍服务利用好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根脉和前进的阶梯。传承弘扬好的最高目标是“汲古慧今”，就是要让古籍支持学术研究，支撑科学决策。上海图书馆一直注重古籍等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展览和出版的有机联动，服务学界、服务社会。

由本馆和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等主办的“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展”在年末的上海掀起一股观展热潮，在短短 14 天的展期内，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下，共计有 1.2 万人次现场观展，33.8 万人次通过历史文献中心微博线上浏览。此次展览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合作伙伴不仅提前一个月即通过公众号连续推送，开始为展览预热，还将广告投放于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向世

界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该展共遴选馆藏唐碑善本六十余种，除了堪称镇馆之宝的“四欧宝笈”外，还有多种宋拓本、孤本、初拓稀见本等珍品碑帖同时展出，旨在大力弘扬碑刻传统文化，全面展示唐碑书法风尚的转变和发展，直观领略馆藏善本碑帖的艺术魅力。与展览配套的图录一经面世即全部售罄。

发挥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协作协调作用。在 2021 年，与上海中医药大学组织开展了《上海市中医古籍联合目录》的编撰，这是上海地区各古籍收藏单位的合作项目，计划 2022 年完成。与上海市金山区文旅局合作开展了《江南藏书文化研究》征文，重点对上海金山清代守山阁出版与藏书进行研究，论文集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2 年出版。

2021 年重点开展了馆藏晚清古籍的整理出版。历经十余年整理，出版了《江南制造局译书全编》40 卷，收书 176 种，是目前江南制造局译书最为全面的一次整理，为学界认识晚清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较为重要的一批文献。近年来尺牘文献深受学界重视，因整理困难，印数不多，出版往往困难重重。今年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集中地推出了瞿鸿禨等人的一批以“未刊”“大宗”为特征近代名人尺牘，在学界引起广泛反响。2022 年将由中华书局、上海人民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吴大澂、丁文江、徐

世昌、张謇的尺牘汇编，继承了顾廷龙先生重视尺牘收藏与刊布的传统。

以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的实施带动文献专题研究。上海图书馆是国内率先开展西洋古籍整理研究的公藏机构之一，在“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过程中，出版了《罗氏藏书》图录阶段性成果，较全面地概括了建国以来我国引进数量最多的这批西洋古籍的内容特点，记录了上海图书馆藏书建设的历史缩影。在家谱国家项目之下，今年出版了两辑近百册上海图书馆藏《珍稀家谱丛刊》。

明年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主要围绕 70 周年馆庆与上图东馆开馆展开。在 2022 年“迎新馆、庆建馆”之际，将重点出版《上海图书馆藏稿抄本丛刊》《上海图书馆藏善本仿真粹编》和《合众图书馆典藏目录汇编》。举行纪念吴大澂逝世 120 周年活动，出版《憲斋集古录》稿本和尺牘。历经多年古籍普查工作的成果《上海图书馆古籍普查目录》也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问世。

未来，在上图东馆正式投入运营后，我们还将把徐家汇藏书楼、长乐路合众图书馆旧址等历史建筑老馆舍进一步规划建设成彰显本馆馆藏特色的研究型主题图书馆，开启全面建设世界级研究型公共图书馆的新征程，努力为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和全面提升上海城市文化软实力做出更大贡献。



“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展”



古籍修复人才曾一度奇缺。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通过培训班、师徒间传习、联合推动学历教育“三驾马车”同时发力，已促使全国修复师数量增长十倍。得益于112年不间断的师徒传承，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于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3年杜伟生成为这个代表性项目的国家级传承人。国家图书馆在文化部的推动下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之后在全国又带动了30余家传习所共同培养人才。国图修复中心也荣获全国专业技术先进集体称号。

经过十几年的人才队伍建设，国家图书馆还特别打造出一支优秀的年轻修复师团队，他们专业背景不同，分别来自化学、书画修复、古籍修复、材料学、文物保护学、汉语言文学、美术学、美术史、考古学、历史等专业；从年龄结构上，有80后、90后，甚至95后，他们已经逐渐成为修复古籍的生力军，甚至主力军。

古籍保护复合型人才团队是如何打造的？

□陈红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开启。古籍工作者期盼已久的全方位的古籍保护工作进入新纪元。

真正开始工作我们发现，人才的困扰成为古籍保护工作推进的牵绊。以修复人员为例，长期以来，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一直沿用口耳相传、师徒授受的单一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手工技艺的传承非常重要，现在依然有生命力，但是师傅传授和徒弟学习一旦出现断链，就影响一脉的技艺传承。特别是，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门科学、一门艺术，不仅需要心灵手巧，需要技能、技术，更需要中国书籍史、目录学、版本学的基本知识，同时需要一定的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基础，从而可以对纸张等材料建立分析，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使古籍修复真正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追踪调研，提出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模式与目标

建章建制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立之初的重要任务。中心领导支持下，我作为中心办公室主任和古保办的年轻同事一起对国外的古籍保护情况进行追踪调研，重点调研了国外古籍保护修复师的教育背景和管理模式。

在国外古籍修复保护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波兰、意大利等，至少有两所以上的高校开设有古籍修复或保护专业，抑或在文物保护专业开设有古籍以及纸质文献的保护方向，相关行业也均有着较为严格的准入制度，从事珍贵古籍修复的人员一般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以法国高校的遗产保护与修复的训练为例，其课程设置兼顾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结合实践。著名的巴黎国家遗产学院的书籍修复师专业科目包括：绘画、微生物学、化学、材料技术、艺术史、修复理论与伦理、文献研究方法、计算

机、法律等，学生每年有大量的手工操作，在第四年还有6个月的实习要在国外进行，第五年需要亲手完成一次文物修复工作，并撰写硕士论文。

在欧洲，有保护师——修复师联盟（E.C.C.O.），当时这个联盟已经有欧洲16个国家的超过5000名会员。在联盟的职业准则中对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背景是这样规定的：

科学和人文的平衡对于理论教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理论主题应由保护/修复领域的专业化所决定，它应包括保护——修复的伦理原则；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矿物学、颜色理论；人文学科，包括如历史学、古文字学、艺术史、考古学、民族学、哲学；材质和工艺史、技术和制造工序；衰退过程的鉴定和研究；文化财产的陈列和运输；保护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预防性保护和修复；制作物件复制品的过程；档案学的方法；科学研究的方法；保护——修复史；法律议题，包括如职业法规，文化遗产法律，保险、商业和税收法律；管理，包括收藏、职员和资源；健康和安全的，包括环境议题；沟通技巧，包括信息技术，等等。

在这份职业准则中对保护修复师的职能做了这样的界定：在保护——修复领域开展项目开发、规划设计与调查研究；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建议与技术支持；为文化遗产准备技术性报告（不包括对其市场价值的判断）；进行研讨讨论；发展教育项目并教学；传播调查、培训与研究中获得的信息；推进对保护——修复领域的更深入理解。

为维护职业的严肃与崇高，准则要求进入保护师——修复师行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从业者最低应为硕士水平，或被认可的同等水平，即应在大学或同等学力机构完成不少于五年全日制的保

护——修复领域学习，并且包括全面的实践实习期。学习结束之后学生应该有继续攻读博士的可能性。这成为当时我们期待的目标。

广罗人才，锻造古籍修复生力军

2011年我回到古籍馆，我们开始着力打造这样的团队。于是，十几年间入馆的年轻修复师中有化学、书画修复、古籍修复、材料学、文物保护学、汉语言文学、美术学、美术史、考古学、历史等不同专业背景，这些80后、90后，甚至95后的修复师经过几年的锻造逐渐成为修复古籍的生力军，甚至主力军。



80后的组长胡泊是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带领着一群年轻人向老一代修复师学修复手法、请教修复经验，并整合材料学、保护学等学科，对修复对象进行检测、绘制病害图、完备修复方案、修复档案，又根据需要，开展对濒临失传的各种修复材料，如瓷青纸、粉蜡笺、丝绸封皮、纯皮纸等进行内部结构解析。他们查阅历史文献，请教文献专家、造纸专家，试制出样品，再经过检验、试用，使多项已经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在修复室焕发着活力。

85后的修复师崔志宾是

美术史专业研究生毕业，2013年毕业后来到修复组，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至少要五年才有修复珍贵古籍文献的机会。她来古籍馆那年恰逢“清宫旧藏天禄琳琅”作为专项修复项目启动，当时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开始试修，崔志宾就给老师打下手。2015年，天禄琳琅旧藏正式大规模修复的时候，她又在传习中心的机制下，拜师天禄琳琅专项修复的首席专家、全国技术能手朱振彬。几年间，她在老师的传帮带下，不仅熟练掌握了古籍文献的修复技术，在修复过程中还边修复、边记录、边研究，发表了《“天禄琳琅”珍藏中前人修复遗存及解决措施综述》传

作。2020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全国范围的修复竞赛，这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与和她一样年轻的小伙伴——李屹东、宋晶、杨凡一起修复的《祠堂画像》，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得了一等奖的第一名。独立申报的“古籍书画修复用绢的复原织造研究”也在为古籍寻找着适配的绢质材料。

还有一位在东京艺术大学文物保护专业毕业的谢谨诚，2012年来到古籍馆做修复。2015年，国家图书馆增加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献，于是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浙江财通证券有限公司的经费支持和西夏文献修复项目首席专家、全国技术能手刘建明的带领下，谢谨诚开始了对西夏文献纸张的分析、修复方案的制定，全程记录修复过程，包括经费使用、各方沟通等，基本熟悉了西夏文献修复的全流程，也是能力上的复合吧。

现实期许，造就一批古籍保护专业复合型人才

国图古籍修复这支年轻团队，团结奋斗，取得了中央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的荣誉，取得了“全国技术先进集体”的称号，申报的“传统书籍修复技艺”今年获批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敦煌遗书修复”获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修复仅仅是古籍保护工作的一部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组长是80后的赵莹博士，她掌握五门外语，又跨敦煌学、中西交流史学科，现在又有古籍数字化管理、文创产品设计实施、展览策划等多个工作方向，假以时日，会成为大学问家吧。

其实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古籍馆不在少数，工作的培养、个人的努力、时代的需要，造就一批跨学科、跨领域的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等专业人才队伍或许不只是期许，而是现实。

国图古籍修复团队的年轻人（上）

从技能到管理，在修复路上不断进阶

□胡 泊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

我于2008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应用化学专业，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我有幸听到了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讲授的古籍修复公开课，也正是这次听课，让我知道了还有古籍修复这样一种职业，并对之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好奇。更巧合的是，就在毕业求职期间，国图恰好要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招聘古籍修复人员，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了简历。记得笔试考试那天，我发了高烧，从学校打车到国图时还遇到堵车，赶到考场时检录都结束了，是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飞奔着把我带到考场才让我有机会完成了最初的笔试。后来又经历了三四轮面试后，我终于有幸成为了2008年入馆的80多位新员工中的一员。古籍馆那年一共入职了8名新人，而我是唯一分到修复组的。现在想想还真是应该感谢那位带我进考场的年轻老师。

刚刚入职时，我是组里岁数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孩。组长和副组长比较年轻，可以算是大姐姐，其他老师基本都是和我父母同辈。因此大家也都很照顾我，有什么我不懂的，都会细心地教我，组里还积极为我创造到组外学习的机会，比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那段时间里举办的提高班、研修班，以及西文古籍修复培训班，基本都让我参加了，这让我的业务技能进步很快。我还申请到了馆内青年课题，这让我的科研能力也得到进一步加强。那时感觉挺幸福的，也心存感激，组里的体力活、节假日值班我都会争着去干。

2010年，在我个人从业经历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组长和组里老师积极联系，派我到故宫跟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建华老师学习书画修复。第二件是在故宫学习期间，我突然接到组长通知，让我回组开会，并提名我担任副组长。但回组开会才知道，组长调去其他部门了，让我主持组里的工作。自此，我的人生和事业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岗位角色的转换，让我不再是被大家呵护的孩子，也不可能全身心地专注于技术学习。相反，组内各项亟待推进和完成的工作，存在的各种矛盾、问题，甚至是家长里短的琐事，一时间扑面而来。那个时间段，也正值“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起步推行阶段，馆里对于古籍修复工作给予了重点关注和部署，很多大型项目陆续开展，如配合古保中心举办培训班，举办古籍修复相关展览，推进西夏文献修复，开展天禄琳琅修复，建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总馆改造搬迁，总馆修复室改造建设，可移动文物修复纸质申请，等等。对于3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要带领一支具有100余年历史，人员结构老的老、小的小的队伍去完成这些重要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印象最深的要算总馆修复室改造那段时间，不仅要完成手头上的藏品修复和组里日常管理，还要配合施工方提出专业化的改造需求、细化每一处施工设计，每天都穿梭于施工现场和分馆的临时修复室之间。记得那时为了保证场地改造后大型修复设备能够一次安装到位，自己还自学了用电脑绘制三维工程图，科学规划了不同功能分区，并精确给出了面积、电路、上下水、空调等需求。施工收尾阶段，原有和新购置的修复又要陆续进场并进行安装调试，那个时候基本每天都要忙到晚上9点才下班。还好，心血没有白费。2013年，修复室完成了全面升级改造。改造后的修复室，场地面积扩充至640余平方米。按照专业化、科研化、功能化、规模化、人文化的建设目标，为文献修复人员量身打造了一个安全、高效、怡人的工作空间，为进一步提升国图古籍修复工作水平、开展科研及教学培训提供了有力保障。

“咱们是业务科组，管理工作再忙，也不能放下业务，不能让自己手生了”，这是几位老师都对我讲过的，让我意识到

了提高业务的重要。那段时间里，忙完各种报文、预算等案头工作后，我便会抓紧一切时间，动手修复藏品。有拿不准的就向组里老师们请教，也会在中午跑到故宫去向徐建华老师学习书画修复，晚上回家和周末时间，也会去做几种当时国图尚未掌握的装帧技术的攻关实验。像大理石花纹纸制作工艺、书口镶金工艺、书壳烫金工艺、撞边手卷制作工艺等都是在这种状态下研究掌握的。

总之，那几年由于管理和业务能力的欠缺，做什么感觉都很忙乱，有时也会感到力不从心，想打退堂鼓。还好有领导们在前面领着，有同事们的理解和支持，那个阶段总算是扛过来了。10年修复组管理工作的历练，让我收获了很多，也有了显著的成长，但现在想想，当时接手当组长还真是不知深浅。

随着工作经验的逐渐丰富，我的工作状态也变得平顺了许多。在全体组员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随着青年人的成长和成才，组里的各项工作都迈上了新的台阶：西域文献修复项目、天禄琳琅修复项目顺利结项，多个大型馆外纸质文物修复项目也在稳步推进；积极申请文化和旅游部非遗保护专项资金，举办天禄琳琅修复、法帖修复、印谱修复等研修班；与社科院大学联合培养古籍修复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9年，被授予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文明号；2021年，国家图书馆“传统书籍装帧技艺”被确认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敦煌遗书修复技艺”被确认为“北京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近年来，文献修复组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可谓捷报频传。

我个人的成长受益于国图对于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视，同时，我也深切认识到，大批优秀人才的涌现，是古籍修复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国图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近年来，我有意识地将青年修复人员的培养作为修复组工作的重点，首先加强管理，搞好组内人才传帮带，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成长氛围。其次为青年人争取跟随馆外名师学习的机会，促进青年人才业务技术全面发展。再次根据青年人的学科背景并结合业务需要，协助他们申报科研课题，帮助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有所成就。此外，选配青年人才承担大型修复项目，提升他们的业务实施和管理能力。

目前，在文献修复组的青年人中，积极上进、努力成才的氛围已经形成，青年人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肯定、积极引导和悉心帮助，同时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又有力地促进了修复、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为国图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充沛的活力，形成了强有力的发展后劲。2020年，修复组的青年人参加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在五个一等奖中占据三席，另有一人获得二等奖，一项获得三等奖，成绩斐然。

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馆里和领导也给予了我很多荣誉和褒奖。2019年11月，获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文博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2021年4月，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用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

被修复魅力折服，持续学习与探索

□崔志宾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献修复组



挖衬、挖镶等。作为一名新人，刚开始接触有时会觉得有些枯燥。印象最深是第一次“齐栏”，在当时的我看来自觉完成得不错了，但还是被老师给打了回来，反复几次后心情多少有些崩溃。现在回想，那些看上去循环往复的工序是对于基本功的最佳学习方式，更是一种对心性、对职业素养的磨练，这种素质也渗透到自那之后我所有的修复工作之中，实在是大有裨益。

此外，在打基本功的过程中也掌握了古籍各种破损状况，如老化、霉蚀、鼠啮、虫蛀、粘连、絮化、缺损等的修复方法。同时，通过不断实践积累了如粘合剂小麦淀粉提取、植物染色等古籍修复基础工作的操作经验。

此后，2015年在传习中心机制下，正式拜古籍修复专家、全国技术能手朱振彬老师为师。与此同时，在2013年启动的清宫天禄琳琅专项修复项目中，我跟随朱老师及组里其他老前辈从打下手做起，一步一步深入修复工作。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一次十分珍贵的学习机会，项目开展期

间，本人的修复技能得到了快速提高。同时，在保护组及组内理化专业背景的年轻同事帮助下，对于古籍的科学保护、修复材料的科学分析等也有了深入认知。

在工作成绩方面，完成了多部珍贵古籍的修复工作。如：天禄琳琅专藏《宋板班马字类》《宋板春秋经传集解》《孟子音义》《明版丹渊集》《元板通志》《元板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汉书》等。其中不乏修复难度较大的古籍，如《唐律疏议》《明版丹渊集》，修复前的样貌为严重粘连的“书砖”，修复过程相当复杂，因此每一步骤操作都历尽艰辛。在修复“天禄琳琅”专藏的同时，也完成傅雷手稿、《漆林章氏宗谱》《六十种曲》等多种名人手稿、新善本及普通古籍的修复工作。通过以上实践使本人专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得到领导、专家的认可与好评。

工作期间，发表了天禄琳琅相关论文《传统染色在“天禄琳琅”修复工作中的应用初探》《“天禄琳琅”珍藏中前人修复遗存及解决措施综述》《一种特殊“接背”方法在古籍修复工作中的

应用——以“天禄琳琅”藏《汉书》（卷七十四至七十五）修复为例》，立项“古籍粉蜡笺纸书衣的研究与仿制”课题研究，努力解决修复中材料难寻的问题。

工作之余，也从事古籍修复相关工作。2016—2019年兼任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讲师，教授“古籍装帧与修复”课程；2017—2021年于国家图书馆社会教育部开办的古籍修复基础班、提高班担任讲师。在与广大古籍修复爱好者交流的过程中，我用我最大努力让他们感受到古籍修复的魅力，教学相长，我也从中收获成长。

古籍修复是一份能让人从中获得平静、很多时候还带有一定的成就感的工作，越做越喜欢。在嘈杂的社会大环境下，我有时会感到很幸运，8年的工作使我学到很多、进步很多。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项专业技能，也是一门需要多角度研究的学科，在这一领域里，作为年轻人的我需要继续学习与探索的方面还有很多，未来可期，我会继续努力。